

那隆剿匪记

1949年12月5日扶南县解放之后，我被调到扶南县剿匪办公室工作。到岗位后立即调查匪情，掌握土匪反动组织和活动情况。国民党白崇禧派来的潜伏军统特务分子土匪姚槐，在宁明县组织了反共救国第一方面军，而且派王膺到扶南五区组织了反共救国军联队第十一纵队，并在同正县组织了第六支队。伪高级法院院长雷啸孔任反共救国军第一方面军司令，直接领导匪六支队组织和活动；黎民强任第六支队司令，兼同正县反共特编队司令。同时成立了同正县匪县府，伪军官马杰担任县长，兼反共特编队副司令，伪村长甘朝周担任匪副县长。匪六支队队伍除惯匪外，还网罗了一八八师部分伪军和地方上的敌伪、军、政、警、宪、反动地富及兵痞流亡分子组成，人数五六百人左右。1950年2月土匪在赛仁村宣布暴动，随即攻入我那隆区，并经常活动于那隆、那权、王寥、石丽、赛仁等地，也流窜到养利、万承、隆安、扶南、邕宁等地。1950年4月16日扶南县重兵进剿盘踞在扶南五区的反共救国军十一纵队时，由于受到震慑，反共救国军扶南县康良乡的土匪由大队长韦庆隆（伪乡长）带领下，跑到那隆和第六支队联合起来，1950年3月至5月占据那隆区一带地区。

扶南县五区围剿土匪战役胜利后，扶南剿匪委员会配合四十四部队和同正剿匪队伍向那隆进军。1950年4月27日，我从第一战役前线刚回来，衣服未洗，发长满面须，组织部长林山到宿舍对我说：“现在形势非常紧张，那隆区土匪暴动后，气焰非常嚣张，大开杀戒，四处下乡围捕我区乡

村干部。部队要去进剿，找人带路，你是武工队长，曾在那些地区活动过，是最好的人选。给你两个人，每人配一匹马，他俩就是你的警卫员和通讯员。如果区乡干部被土匪赶跑了，到时找不到他们，你到那隆后就做治安员并代理区长职务，发动群众剿匪，把区乡村政权组织起来，可以吗”？我立即答应服从组织安排。他说：“那就好，你准备一下，下午就出发，带部队尽最快的速度赶到那隆”。

那隆离扶南县城 50 多公里，我想从昌平去较近，但羊肠小道又是山区，地理不够熟悉，群众基础不明。从驮芦去虽然远些，但道路宽阔，可跑步前进，沿路都有我在地下活动时的交通站和较好的群众基础，随时可以了解匪情，所以当日下午 5 时就和农圃克同志带来的四十四大队一起经汪庄、渠黎到邕桑，找地下同志了解康良乡及驮芦匪情，汇报说：康良匪大队已向那隆去了。我们继续小跑前进，到驮芦已经是次日凌晨 3 时，小休后继续向那隆进军。大约 5 时左右，先头部队汇报，前面山头（即独山）有土匪放哨和挖工事。四十四部队领导用望远镜观察独山后，决定兵分三路，中路攻山头，左右两路包围独山直迫那隆街。我们中路迫到山脚，土匪便向我们射击，我们也以牙还牙，向山头开炮，打三四发炮弹后，山上枪声没有了，我们争先恐后冲上了山头，发现土匪都跑光了。我们从正面直冲那隆街时，街上冷冷清清看不到一个人。我们到区公所放下行李，分头了解情况。我走到街尾圩边的一间屋，发现一个人在屋内向街上窥视。我拔出驳壳枪指着他，他无耐开门求饶，颤抖地说：“我不是土匪，又不杀人”。我一望见此人瘦如藤条，像是吸鸦片的烟鬼，我问他：“土匪在那里？”他说：“在独山放哨的土匪来向马杰县长和黎民强司令报告说，发现有很多

解放军，并听到炮声时大家纷纷向王廖、隆安县方向逃跑了。居民见到土匪随意杀人十分害怕，纷纷逃到邻村躲避，有的还躲在屋里，有的到左洲、养利和万承去投亲戚去了”。我再问他：“土匪在什么地方随意杀人？”，他说：

“在广场，”并说“土匪强迫群众去看杀人，马杰还向群众宣布，凡通共的都要杀，不支持他们也要杀等等，所以群众害怕”。我迫他带我到杀人现场去看，进入这个广场，血腥扑鼻，在三、四百平方米内，满地死尸。解放军问我此人是什么人？我说是群众，他知道土匪去向。解放军领导即拉此人去问话了。接着随军人员及解放军首长初步研究分工由我处理这个现场，并及时把乡村政权组织起来，发动群众继续剿匪，由农圃克同志及抓来的这个吸烟鬼带路，同四十四部队向王廖、隆安方向追赶这帮土匪。

这个独山广场共摆有二十八具尸体，其中有两个女尸满身血红，场面悲惨，有的四肢联体而无头，有的四肢和头都分离，绝大部分尸体的手脚都被割裂抽去手脚筋，有个别还被破肚取去人肝，有些被挖去眼睛；女尸还被割去乳头，阴部被木头或刺刀穿破；有的皮肉已腐烂而且有虫了，看来被杀时间较长了。我们分别找来棺木或床板门扇钉成棺材，把每个尸体四肢头身（有的只能用铲）摆好入棺，就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控诉土匪的罪行。群众义愤填膺。许多人向我们提供情况说：1950年2月27日（旧历正月十一日）土匪黎民强、马杰、甘朝周攻打那隆时，曾和区委书记及区干部数人和以宁子英带领的区中队枪战，我们的同志撤退时被土匪追到更懒村包围，突围后到更盟隘口又被马杰土匪阻击，以后下落不明。赛仁土匪宣称中国反共救国军十一纵队第六支队，是国民党反动派已进驻广西的部队。他们抢占区乡村粮

食，向群众征粮，没有粮就要钱，不给就杀人。经我们工作组向群众宣传，说明反共救国军是由国民党反动派潜伏下来的敌、伪、军、政、警、宪和反动的地方地、富、反、坏及惯匪、地痞流氓组织成立的，他们本质就是坏人，专门压迫剥削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和革命的人。黎民强、马杰、甘朝周都是反动伪军官伪职员。他们和人民特别是和革命政府的人员是对立的，土匪是敌人，我们是正义的。群众大会既是为死者开追悼会，又是现场实物教育会。在场解放军和群众共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不剿灭土匪誓不罢休！共产党万岁！大家动手埋葬了尸体，当时就有人自动站出来要求和部队去剿匪，自告奋勇带路向隆安方向追击。后来打听到这股土匪就在陇柳。从那隆追去的四十四部队及同正县剿匪队伍把这股土匪包围起来，匪首雷啸孔、黎民强、钟飞、马杰带队侥幸逃脱，扶南县反共救国军康良乡匪大队长韦庆隆及三十多个土匪被当场击毙。陇柳之战，这股土匪被打散，四十四部队和同正县剿匪队伍又分头跟踪追击。后来这些土匪都被同正县和扶南县剿匪队伍追捕归案，或被击毙，或公审枪决。四十多年了，这些惊心动魄的艰苦斗争场面，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它告诉我们，革命政权来之不易，保卫政权也十分艰难，要珍惜幸福日子，坚持革命到底。

(李宜固)

安辽、叫蓉战斗的回忆

1948年初，我考入扶南初级中学读书。这一年，在英语老师郭家驹、数学老师韦芳杰、音乐老师黄光军等同志的教育启发下，我追求进步，向往革命思想，反对、抵制反革命宣传。1949年春节后，我毅然弃学，积极参加以郭家驹老师为首的岵桑革命据点的革命活动。同年6月，由郭家驹老师亲自主持宣誓仪式，我宣誓参加了岵桑村武工队。我记得，当时和我一起加入武工队的有郭立基、李宜固、郭为圈、郭灿墉、郭家瑛、梁华山、梁国仕、黄永香（黄永卫）、郭辉丽、郭本馱、郭固基等，郭立基为队长，李宜固、黄永香为副队长。

而后分工是：李宜固、黄永香和我共同负责下屯“群运”工作，秘密串联、宣传发动贫困的群众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征粮、征兵、征税和支持解放军南下解放扶南县。

武工队成立后，征缴财主的武器，并借用一些个人武器，搞好武器装备，以便更有效的对付敌人。一九四九年九月，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在郭家驹和武工队队长的领导下，从岵桑村据点出发，在“蓄底”（地名）跨过左江河，途经驮汀村、山秀、弄河，越过山埂到达了木民村，与木民据点接头，在木民村小学校交换了情报，原计划到长沙村取枪。碰巧伪国民党大部队驻扎在长沙村，所以，我们当晚过不了长沙村，没有完成取枪的任务。过后，由长沙村的钟汉光、钟孔庭等人亲自把枪支送到岵桑据点。

岵桑革命据点建立后，伪扶南县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此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伪特编队和渠黎乡警曾经两次进行围捕，妄想把岵桑革命据点摧跨。但在革命群众的掩护下，敌人的两

次围捕都扑了空，阴谋没有得逞。但他们反对人民、反对革命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不甘心失败的，他们还在捣乱，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共十万大山地委“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迅速建立游击武装，开展武器斗争，以及发动群众，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征兵、征粮、征税的指示”，根据地积极发动了多次武装斗争。

安 辽 伏 击 战

随着群众工作深入，革命思想觉悟的提高，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县特编队十分憎恨。武工队们个个磨拳擦掌，要消灭他们，要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武装自己。此时，根据驮汀村联络员黄俊峰同志送来的确实情报，知道了县特编队某日有一班人护送一批货船往龙州方向去，沿左江河水路而上，并必须经岵桑村的安辽（地名）地带。这是一个河道狭窄的地方，打击伪特编队是很好的地形。因此，晚上十点以后，由队长郭立基带领武工队前往“安辽”设伏。由于群众知道我们的行动，都纷纷参加战斗行列。我们连夜赶到预定地点埋伏，第二天早上天刚亮，特编队的货船缓缓逆水而来。我们沉住气，待货船进入射击范围时，一起开枪，给特编队一个迎头痛击。特编队被打得措手不及，狼狈逃窜，很快被打死二人，击伤一人，缴获枪支四件，子弹数发，物资一批，武工队无一人伤亡。这一伏击战打得好，武工队初露锋芒，取得了武工队成立以后的第一次胜利。

叫 容 阻 击 战

安辽伏击战战斗的胜利，使岵桑村的群众更加踊跃支持武工队的革命行动，武工队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斗志更加旺盛。但是，不甘心失败的伪扶南县反动派政府，出动特编队及民团自卫队两百多人，企图铲除我们据点和武工队。他们在岵桑村南面的平姜村部署了一部分力量，想堵住我们去渠黎乡的路，又在岵桑村东面的布晓村部署了另一部分人马，想堵住去扶南的路，企图两面夹击我们。可他们没有想到，当我们接到情报后，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加强站岗放哨，密切监视敌人的行动。当时，我和李宜园、李佩球三人是头一班站岗，在“叫容”山前沿最高处“蕾吞”（地名）放哨。这是一个制高点，站在那里可以观察到布晓村的情况。在中午时分，将要换班吃饭的时候，伪特编队从布晓村口向我们冲来，我们为了占据有利地形迎击敌人的进攻，就从“蕾吞”撤到叫蓉山“琴岵犬”（壮语名）的山脚下埋伏。伪特编队及其民团自卫队果然冲到我们的埋伏点。激烈的阻击战打响了，我在山右边的一个掩体内对准敌人开枪射击，在我右下边坟堆上的李宜园、李佩球两人也在那时阻击着，还有埋伏在叫蓉册两边的武工队员和革命群众也向敌人开火。顿时，各种枪声、喊叫声连成一片，叫蓉山谷沸腾了起来，硝烟弥漫。由于我们在高处，敌人在低处，敌人尽被挨打。激战了半个多小时，敌人被武工队击伤一人后，就撤回布晓村去了，敌人虽然被我们击退了，但我们还警惕地守卫着叫蓉山阵地，再有另一部分武工队守卫在“叫弄弯”（地名），密切监视着南面驻扎在平姜村敌人的活动。经过这一仗后，大家转入了相持防御，敌人不敢再进犯我们。这时，扶南中队的渠

吞、驮辽、东罗、木民、那隆等的武工队已汇集到了岫桑村。因此，队伍庞大，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响遍了整个山村。伪特编队及民团对此闻声丧胆，偷偷地缩回县城去了。

叫蓉阻击战胜利后，进一步鼓舞了队员和群众的斗志，同时，各个据点的武工的大联合，使力量更加壮大了。我们中队在岫桑村集中整顿一段时间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由中共扶南工委的邓奇干、李芳杰、郭家驯、卢金灿等领导人率领队伍，首先解放了渠黎砥柱乡公所，进驻渠黎街，并阻击伪县长黄济夫的逃窜。而后，就在渠黎街召开大会，组织力量，由郭家驯、邓奇干、韦芳杰、黄肇福等人率领，兵分两路进攻扶南县城。当天下午解放了扶南县城，宣布成立扶南县人民政府。

(李宜水整理)

清除漏匪 巩固基层人民政权

一九五二年九月至一九五三年十月，组织安排我任第一区公安特派员，五二年下半年主要搞土改复查，五三年着重抓严管四类分子和清扫残漏土匪分子，巩固基层人民政权。在这期间，我在龙头处理了两宗漏匪案件。现将实情分述如下：

(一)

一九四九年凤庄乡（当时是小乡）陈子赞、陈彰华，参加过严卓元组织的反共救国军，并接受封官许愿，陈子赞任匪军排长，陈彰华任文书。一九五〇年开展剿匪反霸，匪首严卓元被枪决之后，陈子赞、陈彰华两人摇身一变，冒充积极分子，参加土地改革，潜入凤庄乡农会领导班子，陈子赞任乡民兵队长；陈彰华任农会财粮委员，五二年又转任凤庄小学校长。到土改复查时仍未被发现，因而更加野心勃勃，继续进行反动勾当。

一九五三年我县进行第一届人民代表普选，建立乡人民政权——乡人民政府，我当时被派往该乡任选举委员会主任，在选举进入酝酿乡长候选人时，经区委会研究决定推荐该乡团支部书记卢理养同志为乡长候选人，后来在群众讨论中有人散布卢理养有作风问题。后经详细调查，根本没有这件事。党支部分头到群众中去查访，才知道这一谣言是陈子赞和陈彰华煽风点火刮起来的，妄图打击卢理养同志，以篡夺乡长职位，以维持长期隐瞒的政治目的。在这紧要关头，党区委书记安久昌和我到县向县长高文林和公安局长刘广亨汇报。领导听了以后，当即决定，把造谣者抓起来，然后发动群众控告，召开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控告会。在会上，陈宪彰揭发了陈子赞和陈彰华和他一起去参加反共救国军（陈宪彰已自首得到了宽

大处理),并且接受匪首严卓元委任职务的事实。接着村民陈五三揭发陈子赞、陈彰华,杀害了陈五三和其姘妇王姨的事实,激起了群众愤怒。在群众追问下,陈子赞、陈彰华不但承认了参匪事实,并把杀人经过坦白交代。陈五三原是一个流浪汉,一九四九年临解放,乘社会混乱时,勾引了旧庄乡严寿昭的妻子陈五姨到凤庄村山洞姘居。解放时严寿昭已参加解放军,随军南下到扶南县,调到县民警队任排长。一九五〇年他知道了这个情况,曾到龙头和区委书记左振华同志去凤庄村追查陈五三,结果被其发现溜走,以后同这个女人躲在山洞里不敢露面,陈子赞与陈彰华就乘机与他勾结,接济他食物,晚上轮流奸污了这个女人,后来又怕严寿昭同志追捕,怕陈五姨落网后供出其罪行,于是三人商议,采取杀人灭口。一天晚上,骗陈五姨到左江边,活活打死后,把人头砍断塞下石洞,然后用两块大石头捆绑尸身,推到河中间沉下河底。过后不久,陈子赞和陈彰华又怕陈五三来自首,供出其真相,于是又谋杀了陈五三,把尸体扛到河边和这个女人一样沉尸毁灭。于是这个冤案便无声无息,而他俩个家伙却逍遥法外,直到这次控告会上才水落石出,激起群众的公愤,要求严厉法办。后分别被判处十二年、八年徒刑,送去青海劳改。从而打击了漏匪,纯洁了农会组织,使选举、建立乡人民政权工作进行顺利。

(二)

依靠群众,智捕漏匪严本立。严本立是当时第一区旧庄乡人,由于父母早亡,和弟弟俩人相依为命,后小弟本良前往昌平村入赘,自己成为单身汉子,生活贫困,解放时就选送他到县委警卫班当战士,配给他一支冲锋枪。一九五〇年三月份,各地土匪暴乱,社会动荡不安,严本立思想产生动摇,持枪逃跑回家,并参加了匪帮,潜到邕宁县甘圩一带活动。后被解放

军围剿，收缴了枪支遣散回家。但是到旧庄后，他认为自己偷了县委枪支，罪恶难卸，于是不敢露面，躲藏在旧庄至肖汉的山洞里三年多。村上群众便以为他在战乱中已死，或潜逃出越南了。一九五三年夏，旧庄、凤庄、肖汉村在石山附近的畚地玉米，经常被偷，我考虑当时社会很安定，小偷绝迹，可能是严本立潜藏在附近所干的。但他已几年不见了，哪来有火煮食，一定有人暗中接济，我把这个设想向公安局刘广亨局长反映后，他赞同我的推测，并决定派两名民警随我到旧庄去进行侦察，但我们到旧庄后，却吓坏了给他接济的人不敢出动。住了三十多天，却查不出头绪。于是我想还是靠群众去了解，便和民警退出旧庄。离开时布置乡治安员严日华同志，在每天天亮前到村边去埋伏，观察有没有天亮前后到山上或外面回来的人，结果不到十天时间，就发现了村民谢景兴早早从外面回来，裤角还湿漉漉的。后来我们一分析，谢景兴虽然与严立本没有什么亲戚关系，但他是邻居，平时对严立本很关心。根据谢景兴人老实、性格内向的特点，我们采取智取的办法。谢景兴有个儿子叫谢锡昆，思想进步，是个基干民兵，土改时参加了共青团组织，长期在乡政府做保卫工作。于是我们找他做了细致的思想工作，说出他父亲可能有接济严立本的行为，动员他协同我们动员严立本出来自首。如何做工作呢，我们就叫谢锡昆晚上回家住宿，观察父亲行为后再向他做动员工作，在事实面前才好说服他父亲。果然在一天半夜他看见父亲爬起来，装了一袋米，拾了一包火柴，谢锡昆发现后假装起来小便，也不过问父亲就又睡觉了。他父亲竟开门外出，第二天早上他父亲回来后，锡昆便耐心地做他父亲的思想工作，结果谢景兴接受了他儿子的意见。当时正值到中秋节，谢锡兴去通知严立本天黑后来他家吃饭。我们找了三个与严立本有亲戚关系的人，和他一

起饮酒，一面动员他出来自首。但严立本总是顾虑重重不表态，后拖到十二点钟，我们组织了乡干严廷卓、严治欣、黄尚培，严日华亲自出马，一下涌进了屋，反复向他宣传政策，自首从宽，抗拒从严，只有自首才有出路。经过教育，使他有所醒悟，表示同意，就把他带到了乡政府。公安局刘局长对他进行一番教育后，劝他要带罪立功。无意中他竟说：“渠多匪首韦庆龙和他在一起过，都在肖汉到旧庄村的山洞流窜。”刘局长一听，又惊又喜，立即叫我把他带到后屋去，就打电话与高县长商量，下令调动了扶南、昌平、龙头等乡民兵七、八百人，旧历八月十六日集中交代好任务，当晚十二点前布防，从岂皮村沿旧庄、凤庄、肖汉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十七日天一亮开始搜山，把所有石山岩洞都搜了一遍，最后搜到严立本常躲的山洞，只见有一只沙锅、一只碗、一对筷子，其他一无所有，不象有多人居住的迹象，于是刘局长便追问他到底实情如何，他却说：“你叫我带罪立功，我无话可说，我就乱讲的，实在没有这件事。”当时刘局长气不可忍，扇了他一巴掌，下令把他绑起来送县处理。后来严立本被判刑八年，送去劳教。从此以后，龙头区漏匪全部肃清。

(黄绍威)

青工队培养新干部

1949年11月25日，原绥淦县十万大山工委特派员和地下党特支的领导下，革命游击队（武工队）和地下革命工作者，乘伪政府官员逃离之机接管了县城。1949年12月6日，配合解放军解放了全县，并成立了县人民政府，建立了各级新政权机构。凡是成立了县人民政府，建立了各级新政权机构。凡是骨干的同志都安排了职务，只有一些脱产出来的青年地下革命工作者和社会青年积极分子，一时还没有工作岗位，就组织起来成立青工队，进行学习和培训，为人民新政权培养新干部，充实干部队伍。

青工队的成员先后有：马维驹、李斐武、黄德厚、梁嘉田、黄德才、黄十四、揭显方、潘流芳、陆钟璜、潘白、黄润才、小程、小刘等十多人。青工队原先宣布由黄大统任队长。1949年12月20日，南下工作团来到，青工队就由南下干部丁九思同志负责。

开始，青工队有的队员配合工作组下乡工作。我曾跟随马维驹老师带领的工作组，到一德乡（山圩）的渠怀、那白、九塔等村屯，帮助基层干部宣传革命形势，筹集粮柴草支援解放军、支援前线。一个星期后回县，由丁九思同志组织青工队集中学习，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学习有关形势与任务的文章，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理论水平。学习十来天后，由于当时工作急切需要，青工队就进行分配。我和李斐武、陆钟璜被分配到县财政科财粮训练班学习。梁嘉田、黄德厚、黄德才、黄十四、揭显方，则担负交通任务，定期带枪步行到邕宁县苏圩和上思县等地，输送领取公文

和交换信件。梁嘉田同志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后来成为扶绥县邮电局第一任局长。潘流芳回乡当老师,不久便随剿匪部队当壮话翻译。其他几位年纪较小一点的如潘白、黄润才、小程、小刘,就做县首长的通讯员、警卫员和勤杂员。青工队也从此而解散,其历史虽然不长,但为新政权培养了一批新干部。

县财政科财粮训练班学习结束后,李斐武同志被派到西长粮库工作,我和陆钟璜同志被派到一区(山圩)粮库工作。为使公粮、柴草完成入库与加强管理,县人民政府特决定委任我为本县粮库第一分库管理员。我还兼任了一区政府的总务,管理财务收支。

我和陆钟璜同志到一区后,就按照在县财政科财粮训练班学习到的业务知识,积极开展工作。首先向群众宣传踊跃交送公粮和柴草支援解放军、支援前线的重要意义,同时做好公粮入库的各项准备工作。我们负责管理区政府里面的一个旧粮库,这个粮库年久失修,墙壁裂了缝,有了窟窿,还有老鼠洞,铺板有的破烂了,不能装粮食。我们就自己动手,找来石灰和沙子拌成浆,把墙壁的裂缝、窟窿、老鼠洞填平,并找来好木板换上烂铺板,把旧仓库粉擦一新。群众来送交公粮时,我们热情接待,特地烧好开水,摆好板凳,让群众有休息的地方,使群众感到共产党的干部与国民党的官员截然不同,很是满意。我们一面收粮入库,又一面及时调运粮柴草支援解放军,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促使革命胜利前进。当时,县委组织部长王怀忠到一区指导工作,见我们积极肯干,倍加赞扬。在1950年2月全县干部总结工作大会上,经他极力表扬推荐,我被评为县管库工作模范。1950年3月,我被上调到县委会当文书。

(马维驹)

解放初期接收一德乡的回忆

1949年11月，地下党原绥淦县县长黄元亮，任合原路北武工队长的我为一德乡（今山圩镇）乡长职务。12月6日绥淦县解放，县长即命令我两天内组织武工队伍前去山圩建立乡新政权，筹备战备物资，巩固后方，支援前线。同月8日我组织武工队员32人枪、扛着一面大红旗，上书“地下党接收一德乡政权队伍”十二个大字，前往一德乡公所所在地。当时邕龙公路沿途解放军队伍络绎不绝，追击国民党残军。为避免产生误会，发生冲突，我们决定绕道走小路去山圩。我们急匆匆由小道赶到山圩附近的坝吞和那余村的交界处时，碰上熟人那余村副村长周芝兰（我47年曾在一德乡任过半年中心校辅导员，故他认识我）。周副村长对我说：我组织村民十多人枪，想阻击对面路过往的国民党残军，由于他们人多，我们不敢动手，你们的队伍来得正好，我们合在一起，阻击敌人溃逃。经商量后决定，由我率领武工队在山圩正面设伏阻击，周芝兰副村长带领村民绕敌人背后追击，形成前后夹攻之势。此时敌人已是惊弓之鸟，战斗一打响，便抵挡不住，狼狈地向那白方向溃逃。我们大获全胜，缴获两支步枪，送给那余村队伍。由于不了解山圩街情况，当晚，我们武工队住宿在那余村小学校。晚饭后，周芝兰副村长和我们一起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第二天派人去山圩街侦察，得知街上无国民党残军。又派人去苏圩联系、了解清楚情况，即拉队伍去山圩街贴出布告，宣布新的乡政权成立。由于国民党残军溃败时沿途烧杀掠夺、无恶不作，加上山圩境内原来没有地下党组织活动，群众基础差，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我们到山圩时，群众已纷纷外逃躲避，山圩

成了空圩。我们队伍一时伙食供应困难，只好发动那余村群众支援。我们派武工队员上山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回家；另一方面深入附近村屯宣传解放军已打败国民党军，一德乡已解放等。经过宣传发动，外逃的村民都回到了家里，大家踊跃支援前线 and 借粮（所谓借粮是写白条，盖上乡印作秋征交纳公粮）。时值冬天，天气寒冷，我们每人只有一张毛毯，没有绵衣，店铺又已被溃逃的国民党抢光，我们只好用稻草铺在地上做垫褥，并用作被褥盖。当时山圩是新解放区，还没有得到上级直接供应，一切生活来源都得依靠群众暂时解决。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工作后，南下工作队与原地方工作队组成新政府，日常工作也逐步走上正轨，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实行了供给制，每人一年两套外便衣，两年一件棉衣、一件袄裤、一张五斤左右被褥、一张小蚊帐，大米每人每月 36 斤，食油二两、人民币（已由每张币万元改为每张一元）2 元。当时，由于刚解放，物资还比较贫乏，生活条件艰苦，武工队员中都是农民出身，文化水平低，不愿继续留在乡政府工作，所以大多数人都回家当农民，留下的只有几个人。春节过后土匪暴乱，我们进入剿匪保政权斗争，一直到 50 年 10 月大部队彻底剿灭土匪，转入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组织纯洁农会工作。

（李灿庭）

四维乡政权接收和支前 工作亲历记

建国前，我是绥淦县地下党交通通讯联络站的负责人。1949年12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沿着邕龙公路追击国民党残军，开进了绥淦县城，绥淦县特支按十万山区党委特派员林中的指示，接管绥淦县伪政权，贴出绥淦县人民政府布告，向全县人民宣告绥淦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由黄元亮担任县长，刘文华任副县长。与此同时，各区乡人民政府也分别接收原国民党区乡政权。当时，县长黄元亮宣布任命黄启贵和我分别担任四维乡（今西长）人民政府的乡长、副乡长，抓好当前主要三项工作：一、抓好治安，维持秩序，搞好军民关系；二、做好支前工作，筹足粮草供应过境大军；三、立即组织力量接收四维乡伪政权，张贴公告宣布四维乡人民政府成立并让人民群众知道此事。

由于绥淦县伪政府军政人员尾随国民党败军弃城逃跑了，各伪区乡政府也随即瘫痪起来，加上绥淦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并接管了伪政权，所以，我们在接收四维乡伪政府的工作中，进展顺利，当时也没有遇上什么抵抗力量。我们接收政权在工作方法上大致按上级发的《关于新区接收工作报告》精神进行。首先，通知四维乡的伪职人员集中训话，主要是对他们进行政治形势和政策教育，使其认识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黑暗现实和国民党统治如何贫穷、腐败；使其认识到当前广大人民不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已纷纷投入彻底革命的伟大洪流。要求他们改变原来的反动立